

中国的日本研究

JAPANESE STUDIES IN P.R.C

中华日本学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编

DIRECTORY OF JAPAN SPECIALISTS AND
JAPA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panese Studies Series XXV

199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的日本研究

JAPANESE STUDIES IN P. R. C

中华日本学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编

DIRECTORY OF JAPAN SPECIALISTS AND
JAPA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Japanese Studies Series XXV

199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主 编： 骆为龙 徐一平

副主编： 林 昶 譙 燕

中国的日本研究

中华日本学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乔 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 开本 36 印张 800 千字

印数 0001—3100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941-9/C·86 定价：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出版

前 言

中国的日本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日本研究连绵不断,并曾数次出现高潮。它增进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国的日本研究又一次出现高潮。其标志,是日本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纷纷成立及研究人员队伍的迅速扩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大批研究成果。这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1984年9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全国范围内曾对当时的日本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行过一次普查,并于1985年编成《中国的日本研究》(上、下两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据此于1987年出版了日文版。这本书在10年来的中日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时未能正式出版中文版,实为一件憾事。中华日本学会成立后,有关人员曾多次策划充实修订出版本书中文版。随着中国日本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越来越觉得需要这样一本书。我们认为,再版一本比较详尽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概览,不仅有利于中国日本研究自身的回顾总结,有利于中国学术界的相互了解,而且更有利于我国的日本研究和学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值得高兴的是,这项工作终又重新开展并顺利完成了。

本书是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在全国从事日本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协作下,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全书由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主要日本研究机构、学会及学者简介,以及主要日本研究论著索引书刊、日本研究杂志简介等部分组成。概况部分按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不同时期分别加以论述。日语研究与教学部分因内容较多,另立一节。而包括本次普查结果在内的中国日本研究的最新情况,则收入现状及问题部分。概况部分之后是本次普查资料的汇编,系截止至1996年12月底对普查作出有效回答的组织和个人。包括:

日本研究机构	98个
日本研究学会	43个
日本研究学者	1260人

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特别是建国以后的日本研究成果繁多。本书所列21本日本研究论著索引书籍、资料,从综合或专题方面,基本涵盖了有史以来至1993年初我

国不同时期产生的日本研究成果。仅据其中最新出版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一书的统计,建国后至1993年3月末,中国日本研究学者共出版和发表:

著译作 3529 册

论 文 19465 篇

作为中国日本研究成果另一重要载体,截止至1996年12月底,共有:

日本研究杂志 33 种

本书的筹备和调查工作于1995年11月开始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予了支持,中华日本学会刘德有会长、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严安生主任给予了具体指导。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专门成立了组织这项工作的课题组:

主 编: 骆为龙 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徐一平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副主编: 林 昶 中华日本学会编辑出版部副主任

譙 燕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1996年5月起,由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对中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日本研究机构、学会和学者,分别按照社会科学院系统和大学系统开始进行普查。截至1996年12月底,共向社会科学院系统及其他机构的143个单位发出950套学者调查表,回收610套,回收率为64%;共向大学系统168所学校发出1400套学者调查表,回收850套,回收率61%;日本研究机构和学会调查表的回收率为95%。

在普查的过程中,本课题组克服各种困难,通过电话和书信多次同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行联系和确认工作。课题组还先后多次派人赴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进行了调查。中华日本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1996年4月25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日本研究工作协调会,就日本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交换意见,来自全国20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共近4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通过上述调查和会议,使我们对全国的日本研究工作现状和发展趋向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本书收录的日本研究机构、学会和学者,均按中国简化汉字的笔画顺序排列。为便于使用,在机构及学会名称下面附上了英文译名,学者姓名后附上了汉语拼音。对那些调查表未注英文的机构或学会,我们按照通行的译法作了补充,但不一定符合原机构或学会的习惯译法。书后索引分机构和学会、学者两部分,亦按笔画顺序排列。

学者个人和研究机构、学会情况,均尊重本人、本单位的意见,除进行了一些技术性处理外,原则上不作修改。对于不属本次普查范围的人员,如部分从事日本语言教学而无研究成果者,未予收录。日本语言研究、教学机构,只收录院、系一级,日语教研室未予收录。另外,在这次普查中,有些高龄的资深学者由于退出一线研究工作或健康原因而未作答,一部分学者仅就调查表的有关部分作了简答,也有部分分散于各地

的研究人员一时未能联系上。

本书涉及到大学、研究所、新闻出版、翻译等部门的日本研究学者,他们的学术职称是按系列评定的。为了供阅读使用参考,现列表对照如下:

大学系列	研究系列	翻译系列	记者系列	编辑系列	图书馆系列
教授	研究员	译 审	高级记者	编 审	研究馆员
副教授	副研究员	副译审	主任记者	副编审	副研究馆员
讲 师	助理研究员	翻 译	记 者	编 辑	馆 员
助 教	研究实习员	助理翻译	助理记者	助理编辑	助理馆员

中国台湾省和港澳地区的日本研究,是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分别编印专集,同本书构成一个整体。因此,本书反映的只是中国内地日本研究的概貌。同时由于本书涉及人员多,范围广,部分学者调查表格填写缺项等,加之编者、校者疏漏,书中错误在所难免。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补充和修改,以便使之更趋完善。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课题组得到了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与协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领导和职能部门以及赵阶琦、王仲全、关捷、赵建民、汤重南、李书成、张义素、陶仲霞、施建军、韩铁英、王平、郭颖、韩永顺、林肖、陶福生、王学颖等,给予了许多帮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沈恒炎、总编辑陆象淦给予了大力协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中国的日本研究》课题组

1997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	(1)
古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4)
近现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9)
新中国的日本研究	(20)
中国的日语研究与日语教育	(34)
中国日本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44)
中国主要日本研究机构、学会、学者简介	(49)
日本研究机构	(51)
东北地区	(51)
华北地区	(69)
华东地区	(100)
其他地区	(116)
日本研究学会	(125)
全国性学会	(125)
地区性学会	(140)
日本研究学者	(162)
历史政治专业	(162)
经济专业	(240)
社会文化专业	(308)
语言专业	(368)
文学专业	(492)
中国主要日本研究论著索引书刊、杂志简介	(529)
日本研究论著索引书刊	(531)
日本研究杂志	(537)
机构、学会索引	(545)
学者索引	(548)

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也是研究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在古代文献中,最早把日本记述为“倭”的书籍是《山海经》,其中有4篇是前汉初期的作品。晋太康10年(公元289年)陈寿著的《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则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日本情况。这说明在距今1700年前,日本已被列入中国人的研究范围。从3世纪的《三国志》到20世纪的《清史稿》,多数的中国正史中都写有“倭人传”、“倭国传”、“日本传”、“日本志”等。一个国家撰写有关日本的记述持续了1000多年,在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别无他国。

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历史,先后出现4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明朝。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来自南方海盗的袭扰,为对付来自海上的威胁,而非常重视日本研究。这一时期日本研究由官方扩大到了民间,出现了日本研究的热潮。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1894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对当时的中国震动很大,举国上下开始产生了了解日本、研究日本的急切愿望。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研究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的经验,使中国的日本研究广泛地开展起来。第三次高潮出现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抗日的高潮中,全国上下都关注日本的动向,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对日本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研究成果颇多,有的已达到相当深度。第四次高潮出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为中国的经济走向繁荣注入了活力,也为日本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中国的日本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或质量来看,在中国研究日本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从而出现了全国性的新高潮。随着中日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高潮虽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持续向上发展的。

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同于“欧洲型”的日本学研究,同对日本古典的研究相比较,更加重视现实日本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往往同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各个时代、社会的印记常常折射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上。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无论借鉴日本或警惕日本,日本研究始终都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焦点。当然,随着当时形势的不同,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丰富多样。仅据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辑、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的不完全统计,从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到1993年3月末,包括港、台地区在内,中国共出版有关日本研究的书籍达7651册,其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3529册,约占46%。而在中国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主要日本问题文章,仅建国后至1993年3月末,最保守的统计,也在19400篇以上。在最近20年的日本研究热潮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员。尤其值得注目的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研究人员逐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科学方法。他们的研究已从单纯的记述说明、翻译介绍,发展到深入的专题研究、比较研究乃至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一些高质量的日本研究成果正在不断出现,有的已在世界日本学研究中显露头角。中国的日本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

古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据中国史学家迄今的考证,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记述,始自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

这部著作在“海内北经”中这样写道:“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这是中国有关日本的最早文字记载,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倭”。这个“倭”是否指日本或日本的某地,“海内北经”并没有交待。到了后汉,当时的哲学家王充在其著作中也提到过“倭”,但同样没有具体说明“倭”的地理位置及归属问题。第一次对“倭”的地理作出比较明确记载的是前汉史学家班固。他在其所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写道:“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班固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倭人居住在乐浪海中。所谓“倭”即指日本列岛而言。因此,可以认为,这一记录是中国人关于日本的最早的准确记录。一般认为,《汉书》写于公元1世纪。也就是说,在1世纪时,中国人已在记述和研究日本了。后来,中国的史书不断留下了有关日本的历史文献。日本本国最早写成书籍的是7世纪编纂的《天皇纪》和《国语》,但是传至今天的却只有8世纪编纂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国的日本研究,为填补日本历史的这段“阙史时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历史上最早记述和研究日本,可以说是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特征之一。

在中国古代研究日本的著作中,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公元289年由西晋史学家陈寿(公元223—297年)所著的《三国志·东夷传》(也称《魏志·倭人传》)。全文共1987字,从地理位置、自然风光、国土民情、风俗习惯、生产技术、政治制度乃至中日关系等,都作了扼要的记载。虽然文字不多,但内容相当丰富,是中国古代研究日本的一部杰作。《倭人传》在谈到日本地理位置时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比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述更加明确。《倭人传》在介绍日本政治制度、租赋的同时,还介绍了倭人和中国、朝鲜的关系,说“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等等。这一记载说明当时的日本和邻国之间的往来已很频繁。这是有关中日、日朝之间往来的最早记载。《倭人传》在谈到倭人的风俗习惯时介绍说:“男子无大小,皆鲸面文身”,“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衾,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衾,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

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等等。尽管文中所谈情况，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是在当时交通极不便利的条件下，写得如此详细、具体，应该说已是很不简单的事了，在尔后很长时期内都未曾有人超过它。《倭人传》中的主要记述是正确的，至今仍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从陈寿的《魏志·倭人传》开始，中国关于日本的研究升格为正式的“传”。从3世纪的《三国志》到20世纪的《清史稿》，大多数的中国正史中都写有“倭人传”、“倭国传”、“日本传”、“日本志”等。历代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传略概况如下所示：

书 名	作 者	写作年代	志传名称	对日本(人)的名称	备 注
三国志	陈 寿	晋太康 10 年(289 年)	东夷传	倭 人	
后汉书	范 曄	宋元嘉 22 年(445 年)	东夷传	倭	
宋 书	沈 约	齐永明 6 年(488 年)	东蛮列传	倭 国	
南齐书	萧子显	梁天监 13 年(514 年)	东南夷传	倭 国	
梁 书	姚思廉等	唐贞观 9 年(635 年)	东夷传	倭	
隋 书	魏徵等	唐贞观 10 年(636 年)	东夷传	倭 国	
晋 书	房玄龄等	唐贞观 20 年(646 年)	四夷列传	倭 人	
南 史	李延寿	唐显庆 4 年(659 年)	夷貊传	倭 国	
北 史	李延寿	唐显庆 4 年(659 年)	四夷传	倭	
旧唐书	刘 昫	后晋开运 2 年(945 年)	东夷传	倭国、日本	两称并用
新唐书	欧阳修等	宋嘉佑 6 年(1061 年)	东夷传	日 本	
宋 史	脱脱等	元至正 5 年(1345 年)	外国传	日 本	
明 史	张廷玉等	清乾隆 4 年(1739 年)	外国列传	日 本	
新元史	柯劭忞	民国 9 年(1920 年)	外国传	日 本	
清史稿	赵尔巽等	民国 16 年(1927 年)	邦交志	日 本	

资料来源：武安隆、熊达云著《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历史》(日文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三国志·东夷传》到《新元史·外国传》，中国历代朝廷共编撰了 14 部关于日本国情的史略，记述了古代中日关系和日本社会的发展情况。这说明中国不但最早研究日本，而且是长期持续不断地研究日本。在古代，出现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的史学家对日本特别重视或抱有特别的兴趣，而是产生于中国编纂正史的制度和传统。中国有正史以来，每当朝代更迭之后，即由后一代王朝编写前一代王朝的历史。这已成为一种制度和传统。中国的皇帝把日本看作是朝贺奉贡的国家，所以，自然要把日本写进中国的正史之中了。自唐朝以来，除官撰史书之外，也有一些个人撰写的有关日本的著作，但都十分零碎，没有形成体系。但是，进入明朝以后，个人的

研究著作日益重要,正史等官撰史书降于次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逐步由官方扩大到了民间。各种专门著作相继出版,出现了日本研究的热潮。

明朝以后,面临着两大祸乱:一是来自北方的蒙古人的入侵,另一是来自南方的海上骚扰,即所谓“北虏南倭”。南倭指来自日本的海贼集团即倭寇。倭寇的骚扰始自元末,终于明末,前后延续了200多年,形成对明朝的巨大威胁。当时倭寇从日本列岛沿朝鲜半岛自北向南屡屡袭击明代商人和居民,破坏中国沿海海上运输和正常往来。为了对付倭寇入侵,明朝政府重视对倭寇及日本的研究,明代撰写和出版的大量有关日本方面的著作,大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当时的日本研究,主要出自边防和惩治倭寇的现实需要。推动明朝进行日本研究的另一个因素,是防止日本来自陆上的威胁。日本自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以后,即开始走上侵略朝鲜和企图进攻中国的道路。1592年3月,丰臣秀吉派兵16万入侵朝鲜。作为保护国的明王朝决定举兵援朝,开始了近世以前中日两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给明朝以巨大的冲击,使朝野上下更加重视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介绍日本、研究日本的专著应运而生。例如明代最重要的日本研究著作之一《日本考》(作者李言恭、郝杰),就是在战争时期刻印出来的。

明朝廷除沿用了以往的官撰制度,继续以撰写正史研究日本外,还吸收了民间学者、官员、军人参与日本研究,加之当时印刷和造纸技术有了进步,有关日本研究的成果大量出版,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日本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日本的文章和著作,除官撰史书《新元史·外国传》外,主要论述日本的著作,不下数十种之多。在众多的日本研究著作中,薛俊所撰写的《日本考略》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日本研究专著。全书共3卷(一说为4卷),但现存只有1卷,约1万字。这部著作由沿革、境界、州郡、属国、山川、特产、户籍、世纪、制度、风俗、朝贡、贡物、边寇、文词、寄语、评议、防御等17略组成,内容比较详尽。其中《寄语略》为明朝时日本研究的一种新尝试。寄语为日语中译词,为中日对译单词集。《寄语略》中共收集350多个日语单词,按天文、地理、人物、花草、衣物和饮食等,共分15类。《朝贡略》记述自汉朝至明嘉靖2年的中日关系,是研究古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边寇略》主要记述明洪武、永乐、正统和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情况。《日本考略》完全摆脱了旧式研究方法,突破了官撰正史研究的死板格式,参与编写的人员也不限于少数人的旧式做法,只要学有专长,都可以著书立说,独自发表研究成果,开辟了自主研究的新途径。

另一部研究水平较高、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专著是郑若曾撰写的《筹海图编》。该书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防止倭寇入侵和进行抵抗平伐上。全书共13卷,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其中第二卷除集中记述日本和中日关系外,在《王官使倭事略》章编后还附有中国旅日航路图,即《太仓使往日本针路》、《福建使往日本针路》。这对于研究中日航路很有价值。同卷《倭国事略》中记述了倭寇的活动规律、倭寇出身以及评论日本天皇和中国皇帝的差异,等等。这部著作在记述方式和内容方面都大大不同于以往的研究,

而带有一定程度的探索精神,反映了当时的日本研究已达到相当深度。

中国人研究日本,在古代有一个传统性的缺陷,即隔海研究日本。这一研究方法长期未能得到改正,因此对日本的了解和记述比较片面,研究成果的质量不高,有些明显的错误一直未能得到纠正。明朝的日本研究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研究方法,但是通过实地调查进行查核对比的研究方式比以前更加普遍。郑若曾撰写的《筹海图编》就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他亲自前往日本,“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深入地进行了直接调查和观察,通过掌握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撰写专著。这种方法比以往抄袭、记录听闻,甚至推断的方法大大前进了一步,使得研究成果在内容的广泛性、史料的真实性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郑舜功撰写的《日本一鉴》的研究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度。它是一部介绍日本情况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记述。在该书的《寄语》中收集的词汇达 3410 个,远远超过了《日本考略》中 350 多个词汇的水平。《日本一鉴》还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如职员栏、人物栏、室宇栏、器用栏、鬼神栏、佛法栏等。这些内容是过去任何专著都未曾涉及的新领域。作者记述的每一事物都查有出处。如他记述的 614 个郡名、町村数及官名都来源于日本典籍和文件。因此,可信性和精确度都较高。就整体而言,这部著作是当时日本研究集大成之作。

和历代一样,在清初撰修的《明史》中也撰写了《日本传》。《日本传》和整个《明史》同样,篇幅较大,内容丰富多采。其中心置于明朝和日本的关系,重点有四:(1)明朝和怀良亲王之间反复无常的关系;(2)勘合贸易;(3)倭寇;(4)朝鲜战争。《明史·日本传》生动地记述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朝和日本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勘合贸易。《明史·日本传》用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有关情况。因为当时的中国把这种贸易看作是政治上的“朝贡”,并不认为是贸易的存在。由于修史者是从这样一种观点观察问题,所以特别注意使者的态度如何,是否携有奉表,表文是否恭顺以及入境后的态度怎样,等等。由于这种缘故,这部分作为两国外交关系史料的价值较高,而作为贸易史料的价值则较低。《明史·日本传》关于倭寇的记述比较详细,而且也作了适当的分析。至于倭寇对朝鲜的侵略,记述得很简单,有关日本侵略的经过详情,记述在《朝鲜传》中。中国的日本历史学家指出,《明史·日本传》的缺点在于它的内容有些偏颇,关于日本国内情况的记述太少,甚至根本没有谈及当时以数量众多的入明僧人为主的中日文化交流情况。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缺陷。

1644 年清朝建立到鸦片战争前,正值日本锁国时代,日本对内严禁日本人出国,不许与外国人接触,对外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日本,只允许中国、荷兰和朝鲜人进入指定的地方。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少量的贸易被指定在长崎的“唐人馆”进行。这一时期,不仅谈不上日本研究,而且连对日本的了解也不多。当时的清朝,国势隆盛,把日本仅仅看成一个“朝贡小国”。乾隆时,由皇帝授命编写的《皇清职贡图》一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述只有 139 个字,足见清朝当时对日本是漠不关心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研究成果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翁广平于清嘉庆 19 年(1814 年)写成的《吾妻镜补》(别名“日本国志”)一书。《吾妻镜补》实际上是在《吾妻

镜》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吾妻镜补》分 30 卷装和 28 卷装两种。内容包括天皇世系表(10 卷),除记载天皇世系之外,还记载中日交流史要,此外还包括地理、风土志、食货志、通商条规、职官志、国书、兵事、附属国志、杂记等若干卷。另有艺文志(7 卷),刊登 5 世纪至 9 世纪期间近 60 位日本学者、文人、诗人的大量作品等。《吾妻镜补》实为“日本国志”,内容广泛,资料翔实,是清朝前期中国人研究锁国时代日本的一部代表作。除《吾妻镜补》外,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成果还有陈伦炯著《海国见闻录》中的《东洋记》和汪鹏撰写的《袖海编》。两位作者都到过日本,但由于日本严格限制外国人的活动,陈、汪虽身在日本,但见闻有限,多半只记述了长崎一带风土民情,在学术上价值不大。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随之有了急速的发展。

(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骆为龙)

近现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经过鸦片战争和明治维新,中日两国社会进入近代时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变法图强均遭失败。而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以后,打破了封建保守的陈规陋习,积极学习西方,进行大胆的维新改革,大奏成效。尤其是日本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对清朝廷及普通中国人震动极大。部分先觉之士犹如大梦初醒,纷纷进行反思,产生了了解日本、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急切愿望,即便是保守的在朝官员也不得不顾及广大人民的愿望,着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一些急进的改革派,如康有为等,著书立说,积极倡导维新改革,提出“以强敌为师”的口号,他说中国学习日本可以“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不为”。他把日本形象地比喻作为“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老农、识途之老马”。

在这种背景下,从日本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短短的几十年中间,中国出现了一个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高潮。这个高潮的突出表现,是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学习和研究日本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到1903年,留学生人数即增至千余人,1901—1906年留学生人数达12909人。中国留学生分布在日本各地近百所学校,攻读有关数理、工、医、文史、法政、艺术、军事等专业。在留日期间,他们不仅学习到日本的自然科学,而且也学习到了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涌现出了很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军事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一大批日本研究人才。这一高潮的另一表现是,大批中国学者、爱国志士纷纷赴日参观访问,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寻求中国富强之道。民间团体乃至个人赴日参观访问游历者,更是络绎不绝。这些人除少数系游山玩水之外,多数是为了了解日本、学习研究日本而去的。他们回国之后撰写文章、游记,介绍日本,宣传日本近代化的经验,对中国革命、中国的近代化以及中日友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日本研究的学者、专家。其主要人物和研究成果见下表: